



# 新诗的“开国合唱”

吕进

今年我们迎来了新中国七十二华诞。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庄严宣告，结束了中国近百年的屈辱历史，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那个激动人心的日子里，新诗也参与到万众欢呼的行列，张开双臂，唱响发自肺腑的时代强音。

在开国大典当天，郭沫若就在《人民日报》发表《新华颂》：“艰难缔造庆成功，五星红旗遍地红。”10月1日下午3时的开国大典前，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重要文件，确定了国旗、国歌、国都，选举出中央人民政府组成人员。1949年9月27日，《光明日报》发表臧克家的诗《皆大欢喜——祝人民政协成功》：“它在时间上/轰然一声/它将绘出一个/崭新的中国”。

诗人何其芳的经典名篇《我们最伟大的节日》以深情、细致的诗句抒写了开国大典的盛况，这首诗后来收入中学语文课本。诗人是从人民政协会议起笔的，他是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还是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成员，躬逢其盛，激情满怀。《我们最伟大的节日》开始的一个诗节是这样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隆隆的雷声里诞生。

是如此巨大的国家的诞生，

是经过了如此长期的苦痛

而又如此欢乐的诞生。

就不能不像暴风雨一样打击着敌人，

像雷一样发出震动世界的声音……

“隆隆的雷声”不但是诗的意象，也是现实世界的现实。在这首长诗前，何其芳一篇小序，他回忆道：“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开幕。毛泽东主席在开幕词中说：‘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他讲话以后，一阵短促的暴风雨突然来临，我们坐在会场里也听到了由远而近的雷声。”这犹如天意的“隆隆的雷声”，这振奋人心的“隆隆的雷声”在会场震响，在出席政协会议的人们心上震响。而在10月1日，它幻变为54门礼炮，一齐发出28声轰鸣，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在这礼炮声里昂然走进现代中国的历史，登上了世界舞台。

同样是政协代表的诗人胡风写了交响乐一般的颂诗《时间开始了》，这首长诗包括欢乐颂、光荣赞、青春曲、英雄谱、胜利颂五部曲。诗人用七月诗派特有的激昂和豪放的谱写写成的第一部曲《欢乐颂》经《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0日刊出，立即受到欢迎，流传很广，一时洛阳纸贵。苏联的《十月》杂志也将《欢乐颂》译成俄语隆重刊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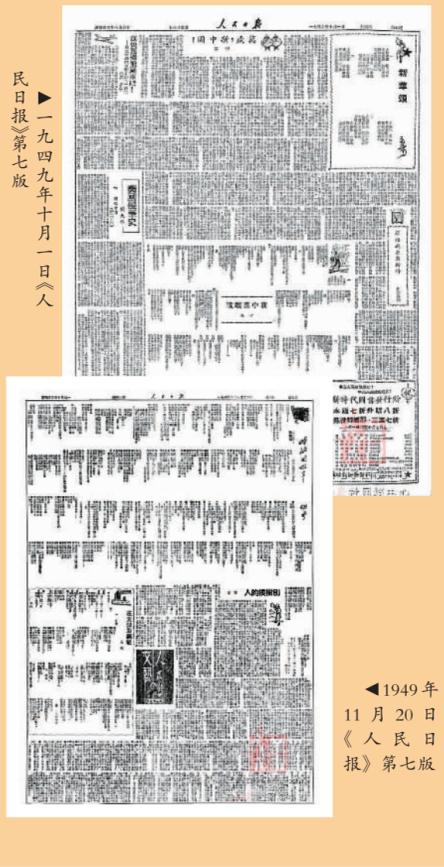
国旗是新中国的象征，“美丽的旗，庄严的旗，革命的旗，团结的旗”（艾青），诗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五星红旗，艾青的《国旗》（1949年9月27日），鲁藜的《新的国旗，更高地升起》（1949年9月28日），严辰1949年10月留下的《国旗》，至今读来仍能令人感受来自历史深处的回响，产生强烈的共鸣。其中，鲁藜的《新的国旗，更高地升起》，后来由曹火星谱曲，改题为《更高地举起》，成了当时的“流行歌曲”。70多年过去了，艾青的《国旗》现在仍然是诗歌朗诵会的常客，赢得了一代代人的掌声。

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时候，人民解放战争还没有结束，当时中国华南、西南以及沿海岛屿还没有解放。1949年11月30日，西南地区重镇重庆喜迎解放。后来成为重庆市文联主席的诗人方敬是中共地下党员，从“地下”走到“地上”，他心情无比激动，立即写出了自己迎接日出、拥抱新中国的诗篇《日出》，诗人唱道：“我们的血管里流着光/我们的目光炯炯/要把发亮的心献给太阳”。

新诗的“开国合唱”给我们留下的最重要的启示，就是诗一定要处理好与时代的关系，这是诗歌的生命线。回眸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新诗，“时代性”这几个字像粗体大字般，展现在我们面前。

从民族诗歌传统来说，时代性是中国诗鲜明的特质。细心考察就不难发现，在我们民族诗歌的流变中，总会有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恒定的艺术元素，这就是中国诗歌的“常”，守常求变才是诗歌发展的坦途。在中国，太湖水气氤氲，诗的份量就增加了。这是一个重要的“常”。自由洒脱的李白，沉郁顿挫的杜甫，纯净内向的李商隐，哀婉悲痛的李煜，笔墨凝重的苏东坡，以身许国、准备马革裹尸的辛弃疾，“家祭无忘告乃翁”的陆游，愁思满怀的纳兰性德，虽然他们的艺术个性各具光彩，他们的人生际遇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对个人命运的咏叹，常常与对家国兴衰的关注联系在一起。

新诗的“开国合唱”其实就是中国诗歌传统的现代延续，它从远古走来，带着历史的足音与时代的创造，在中国掀开历史新篇章的时候，新诗没有缺席。新诗在上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曾两次创造辉煌。在那时，诗引发全社会强烈的共鸣，广泛地融入社会生活。可以说，凡有人群的地方，均有诗的声音。和“开国合唱”



人民日报第七版

1949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第七版

的诗篇一样，两次新诗高潮都证明，诗的价值，正在于它是时代情感的记录。有了时代性，诗对于读者的“亲切性”（黑格尔语）、诗的分量就增加了。

新诗的“开国合唱”对我们当下的诗歌创作无疑具有启示意义，尤其是对那些专注于抒写一己悲欢、感官享受、原始欲望的篇什。由于与时代拉开了距离，一些作品成了某些诗人的“私歌”，游离于时代风云、社会生活之外。须知，诗的生命是在诗中，不是在诗人的个人身世中，诗人绝不能只做一己灵魂的保姆，诗歌要表达时代精神、抒写时代情绪。

新诗的“开国合唱”已经与历史同在，这些文学珍品不仅具有“诗歌考古学”的价值，更具有现实的诗学意义。

在与古人心灵的对话中，李修文用情至深，而且这种情是一种中国情愫。《诗来见我》涉及到当代散文如何处理古典文学经验的问题。它启示我们，要真正赓续中国诗歌的传统精神，还需要当代有活力的作家对于古典知识进行内化，遂心应手地应用到日常写作中来，也即通过学习古典诗歌的智慧，来寻找我们民族特有的情感表达方式。

中国的写情传统，有一种对集体的信任和维护意识，一种高洁与忠诚的超拔之气，这就促成了个人情感的节制与突破。重要的是，正是在这种节制与突破的双重变奏之下，才出现了一些深情婉转、铿锵有力的作品。因此，适当地借鉴古人的写作机心，其实反而是从文学本体的层面学习一种似旧还新的表达方式。

李修文有这样的修养和性灵，所以他遇见古人，正如他自己所言：“我所写下的不仅是我的审美对象，更是我自身命运的一部分。”《诗来见我》中有着无奈的离别、浮世的喧哗等一系列众生皆有的困境。但是他在这种困境中有着最好的栖居之所，那就是古典诗歌。所以当思念友人的时候，他能从元白的唱和联想到与友人的通信，从而更加领会缘分的珍贵与外物无关；当身在异乡，孤寂难言时，他又能与李商隐、罗隐、宋之问、寇准、刘禹锡、柳宗元等“命中犯驿”的人进行交谈，并且比较他们对待艰苦旅途的态度，从而找出自己的同道。诗歌给他一种特殊能力——明明认清现实，却还能在跨越古今的酬唱之中得到前行的力量。

“也许，一觉醒来，到了明早，到了真正的别离之时，我也能够像他一样，写出一首诗，再身怀着信心与作证之心，奔跑着，成为无数无名氏中间的一个。”这是在波澜涌动之后，通过与古人对话而找到的对生活的平常心。他知道，拥有这一瞬间的喘息，才是一个人在在过的最好证明。

（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日月西东》是荆歌的一本新书，小说散文随笔样样有，从苏州到马德里，相距万里的两座城市因为荆歌的缘故，被并置在一起。

炎炎夏日，在杭州寓所一个人闲读，读出了淋漓之气。以前也读过他不少文章，但这次不一样，借着20万字，我仿佛把荆歌的前世今生看了个清楚。那个19岁多愁善感的江南少年，是如何深爱着苏州这座风雅之城；50岁以后他又是如何沉溺于马德里碧蓝天空中朵朵白云，再后来苏州马德里两头跑。直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他才又定决心在苏州久居，我们于是有了机会喝酒长聚。

《日月西东》中的小说《今年在马德里》，荆歌用他一贯略带俏皮的叙述了一个悲悯的故事，好似云淡风轻，但又有滚烫的熔岩在喷发。当时我正在欧洲的铁路路上，读到这个小说，有一种震撼之感。很快我穿梭到了西班牙街头，被悲绝绝望的弗拉明戈舞蹈击中，我也写了个短篇小说《消失于西班牙》。可能潜意识中，我是用它来向荆歌致敬的。

很难想象，他在西班牙一年写了几十篇小说，还有十几本童书。荆歌写童书，自有他天真烂漫和苏州说书人的幽默。我把《他们的塔》推荐给孩子们后，他们喜欢得不得了。小说中的苏州文化元素随处可见：笠泽古镇的黑豆腐干、藏书羊肉、小巷深处的评弹、老街巷里的古玩店……我想荆歌在马德里创作时，脑海里涌现的其实都是故乡的人和景，他也仿佛回到了儿时，记忆结成蚌珠，纷至沓来。《诗卷不忧伤》《小米芒》……一本又一本，荆歌的跨界相当成功，大道至简，他在儿童文学作品中种下了善与美。

幸亏荆歌回了苏州，我们也重拾了友谊。在太湖畔喝酒，太湖水气氤氲，这和荆歌的清风酒风相当吻合。荆歌酒品好，虎牙一露，一饮而尽。他性情率真，说几个段子，唱一首歌，赏一块随身带的玉，酒后泼墨写字画画。一袭藕花风，一支绿莲蓬，一只红蜻蜓，浅浅低飞，意趣盎然。没带印章也不要紧，有荆歌自制的“拇指印”，按下去，一小方，谁也模仿不来。

荆歌是典型的苏州才子，才气、书卷气、傲气都有，落落不羁、才情毕现。很多人感觉荆歌是从明朝走来的，小说家林那北甚至说：“荆歌与唐伯虎，很多优点这两人都有点相似：能写，会画，才高七点五斗。”

荆歌是个标准的美食家，对于吃津津乐道，而且千方百计要吃得。在《日月西东》这本书的爱苏式《苏州四块肉》《吃蟹头趣》《夜吃洞庭饭店》《大厨毕建民》，把苏州人对于美食不可遏制的追求表达得酣畅淋漓。“苏州的食客，贪图的就是鸡头米沁人心脾的自然清香，还有它咬嚼时亦初亦糯的劲头。而这种美妙的食物，却常常很难为外地人所接受。”瞧瞧，苏州本地人骨子里对吃的偏好多特别。“（鸡头米）的清香超凡脱俗，就像明代绣楼上小姐的焚香抚琴，缥缈中是一缕缕寂寞的伤春。”看看，这样的比喻自有苏州人的优雅和腔调。

为了保证下厨的食材新鲜，他宁愿开一个小时车到吴江松陵菜场。做好菜以后，有时他会在朋友圈晒一下，譬如：腌太湖白鱼和猪肉一起清蒸、阳澄湖野生昂刺鱼、六月黄、正宗太湖虾。

荆歌还贪恋苏州吴中的山水水。在文中，他表达出这样的意思：紫金庵里啜杯碧螺春茶，安静地坐个下午比什么都好。东山老红木家具店，总有一些东西会让人眼前一亮。西山的缥缈峰，站在山顶，眼前铺展开的是浩瀚的太湖风光。



荆歌绘

## 解码文学空间

### 姑苏城外话荆歌

葛芳

我在吴中，我想好了，一回苏州，就约上荆歌去东山西山喝茶喝酒，再聊他在《收获》发表的小说《叙事课》。这是荆歌短篇小说创作的又一高峰。成长的矛盾、精神的困境，荆歌始终攫住“人性”在深挖，只不过这次他变成了魔术师，虚实虚实，云遮雾绕，最后打开魔盒，让观众沉思良久。他说：“文学圈不少人以为我写儿童文学写得，我就来个成人小说验证一下。”依旧是诙谐的荆歌式语言。

### 《哈瓦那波浪》——叙写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故事

本报（记者张鹏禹）全球化时代，遍布世界各地的中国人有着怎样的生活经历与生命体验？在邱华栋的全新小说《哈瓦那波浪》中，读者或许可以找到答案。10月16日，该书作者邱华栋与作家祝勇、文学评论家张莉、汉学家夏海明、卡佳、伊斯曼，在北京十月文学院举办的“大山大海大地：人与世界的相遇——邱华栋《哈瓦那波浪》新书分享会”上，分享了该书的创作与阅读体会。

《哈瓦那波浪》由《望云而行》《唯有大海不悲伤》《鲟鱼猎人》《鹰的阴影》《圣保罗在下雨》等9篇小说组成，故事发生在世界各地，但写的都是华人故事。小说兼具中国性、世界性与博物感，既呈现出民族国家间的习俗文化差异，又彰显了跨越文化实现心灵共通的可能。

关于《哈瓦那波浪》，作者曾自述这一系列小说的写作缘由，是有一次在把玩地球仪时，突然起意，在地球仪上随机选了9个地方——太平洋、澳大利亚、中亚、古巴、巴西、俄罗斯、非洲、法国、冰岛，于是他以这些地点为背景，写出了全球化背景下新一代中国人在海外的生活故事。伊斯曼说，书中我最喜欢的是《河马按摩师》，背景在非洲国家肯尼亚，让我倍感亲切。我们非洲人非常喜欢中医，尤其喜欢按摩，这个故事非常接地气。

“这9篇小说是9个中国故事，书写了现代人的9种心灵困境。作为铁汉柔情的作家，邱华栋试图通过人与世界交往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治愈受伤的心灵。”张莉评价说。

### ◎新作评介

## 细微之处，缝合古今

——评李修文散文集《诗来见我》

尹林



新时期文学经历了一定程度的文体融合，具体到散文，则是其叙事的不增强，用以弥补单纯抒情的空疏之感。李修文的散文集《诗来见我》就有着强烈的叙事意识，这是为了更好地与古人对话所进行的密集文化书写。而这种书写，则以中国旧体诗词为载体。

《诗来见我》虽然有着文体融合的特征，却又不仅体现在散文的叙事手法上，它还融汇了古代的诗话和笔记。试着书中作家对一些诗人诗作的评价，比如对元稹和白居易的关系，作者说“这二人之交从未凌空蹈虚，所有献给对方的狂喜、绞痛和眼泪，都诞生和深埋在烟火、糟糠、种种欲罢不能又或画地为牢之处。”他认为李白将生身后的全部都交付给了大鹏，通过这只大鹏，将孔子、八裔与万世交融在一起。此外，对于屈原、宋之问、柳宗元、罗隐、苏轼、辛弃疾、李清照等人，他也有入诗合一之论。虽不似学术研究般严密，但却是以诚唤诚，以心交心，在诗中见到了想见的古人，也见到了想见的自己。

如此密集的评点，知人论世又超脱，像极了本事诗，像极了诗品诗话，又像极了《世说新语》。因此，这部作品的文体意义，远非小说、散文两大类所能概

括。可以说，在以散文为形的前提下，李修文力图不断向内挖掘，通过内心的沟壑与脑海中的繁星，完成一种波澜不惊的、静态的文体探索。

《诗来见我》中的诗对李修文的意义，就好比科学对于众人是一种万物理论（一切事物的理论）一般，诗就是这个“痴人”的万物理论。这本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文化，但这种“文化”，并不是盲目复古，也不似当下许多人对古诗的解读，非要用跨越时空的玄语，来作现实的鸡汤，最终落得一个心安。

李修文反其道而行之，别人以古语的幽玄来化现实的沉疴，他却以自身的仓皇去回应古诗中那些客子书生的仓皇。书中的20篇散文，主题有友情、旅途、怀古、自遣、针砭、故里、亲情、离别、饮酒等。这些主题又有一个基调——沉郁。沉郁要求不能有太多路数，也不能太浮动了尘世，最关键的，沉郁还要求虔诚。

他选择了一种颇为寂寞且危险的想法，一种“套古”嫌疑的古典作派来作为构思的模具。他的敏感随处可得，又遍览山川有着更多的壮游经历。这就使得他常常能想到一些诗句，并且在这些诗句中藏身，等来自己的知音，再回到现实世界，以看似无奈但却坚定万分的态度来对待下一步的生活。他在古诗中寻找的，往往是遍经崎岖、方见真我的人生轨迹。

### 建平台 强翻译 培养海外作者——

## 网络文学创新“出海”模式

本报记者 张鹏禹

近年来，网络文学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新亮点。《2021年中国网络文学出海研究报告》数据显示，2020年网络文学出海市场规模增速为145%，海外市场规模达11.3亿；用户规模增速160.4%，达8316.1万人。预计在2021年，市场规模仍将翻倍增长。在10月11日于北京举办的“第五届中国‘网络文学+’大会走出去论坛”上，业界人士围绕“传扬中国好故事，探索出海文化新模式”这一主题共研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路径，共话中国网络文学“扬帆出海”新模式。

五洲传播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关宏介绍说，为配合建党百年宣传，五洲传播出版社与中国“网络文学+”大会合作，挑选了《玉堂酱园》《人民医生》等多部反映建党百年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题材网络小说，邀请阿拉伯译者、阿拉伯本土作家以及中国译者合作将它们翻译成阿拉伯文，在五洲传播出版社自建的that's

books平台上连载，从6月25日上线至今，这3部作品的点击量接近60万，得到了阿拉伯读者广泛好评。

据了解，that's books平台是五洲传播出版社瞄准阿拉伯和拉美地区缺乏有实力的数字阅读平台的市场机遇，“造船出海”，将中国内容镶嵌在本地内容中，自建的多文版数字阅读平台。目前that's books西语APP下载量达52万，用户覆盖墨西哥、哥伦比亚、秘鲁、智利等国。阿语APP下载量超过640万，用户遍及全球175个国家和地区，在阿拉伯本地数字阅读平台的排行榜上位居第二。

阅文集团旗下海外门户起点国际用4年多时间吸纳和培养来自世界各地近300名优秀翻译和编辑，上线了1700余部翻译作品，覆盖英语、西班牙语、印尼语、印地语、马来语等语种。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6月，起点国际作家人数接近19万，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比增长130%；用本土语言进行创作的原创作品超28万部，同比增长120%。

阅文集团海外业务内容负责人孙丹青介绍说：“起点国际通过平衡作家、译者和读者的利益，建立了一个可盈利的商业模式。‘逐章销售’的订阅模式让读者可以更灵活地选择他们喜爱的作品，并通过平台内的在线互动拥有与作家共同创作的机会。今年，起点国际启动了全球作家孵化项目，未来会培养更多热爱阅读、热爱写作的年轻作家，投入到创造好故事的浪潮中。”

点众科技董事长陈瑞卿说，“Webfic”APP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数字阅读服务，尤其在北美、东南亚、欧洲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在海外，点众科技实施‘三步走’发展策略：一是走出去。通过翻译将中国优秀网络文学作品带到海外。二是走进去。计划培养一批海外网络文学作者进行原创。三是走上去。通过3到5年的时间，在海外再造一个点众，力争成为海外文学的头部企业之一。”

据了解，点众科技拥有“点众阅读”“点众文学”“Webfic”3个数字阅读品牌。目前其海外数字阅读业务为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500多万用户提供英语、西班牙语、泰语、印尼语等多语种数字阅读服务。